

# 舆论学及其研究的范畴

刘 建 明

人人都生活在舆论的海洋中，每天从四面八方接受大量意见、观点、传说、消息，并往往根据舆论判断周围的一切，决定作出什么反应以及如何行动。街谈巷议、窃窃私语、辩解论争、协商对话、公众议政、联名上访、啸聚举事、新闻传播及各种宣传鼓动……酿成接连不断的社会舆论行为，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上自国家元首、社会贤达，下至庶民泛众、刍荛匹夫，都需要把握舆论规律确立自己的行动方位，并向对立的舆论顽强搏击，以捍卫自己的形象、声誉和利益。高级管理人员通常运用舆论力量统一群众的意志，实施神机妙算的决策，把舆论视作测定社会动向的晴雨表。舆论作为社会机体运行的风标，为民主政治、科学决策和公共关系活动提供准确无误的目标导向，因而，舆论学已经雄心勃勃地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行列，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教科书。

## 一、舆论学研究溯源

舆论学是关于舆论产生、形成及其社会功能的科学，在人类社会中有很悠久的研究历史。在古代各民族的生活中，大体都出现过游说、论辩的灿烂时代，重视辩论的理论与实践一度成为人类早期的重要

文化活动。令人追忆神往的古希腊伯利克里时期，崇尚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雄辩，曾化为民主政治的奇光异彩，孕育了一批象高尔基亚、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那样杰出的论辩大师。普罗塔哥拉招收学生传授论辩术，为奴隶主阶级培养放言高论的舆论旗手，可谓人类最早的舆论研究。继往开来的另一位伟大的奴隶主政治家亚里士多德写出了《政治学》、《论辩学》等光辉著述，在自己创办的雅典学园中向弟子讲授以舆论活动技巧为核心的政治艺术。他在《政治学》中多处探讨了“多人议政”的性质和好处，以“民选总裁制”根据民意和大众拥戴的事实，赞颂耸立在臣民公意基础上的君主政体“为公众树立了不朽的勋业”<sup>①</sup>。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民意的概念，全面揭示了民意与专权、民主与公众的关系，成为古代舆论研究的顶峰。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趣，17世纪中叶，舆论的社会命运引起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因为封建贵族异常仇视舆论的勃兴，把一切不同于皇权、教会的意见视为“妖言惑众”加以扼杀，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则渴望民主的社会环境，为争得政治权力、自由贸易创造条件，这就必须击溃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舆论禁锢。英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洛克首先敲响了震撼西欧大地的舆论之钟，提出“民主——民

众一致意见”论。他在《政府论》一书中认为，社会共同体是多数人协议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晶，人们依靠这种意见“以谋求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生活”<sup>②</sup>。他把人民的同意看作政治存在的基础，主张一切清明政治必须以公众的赞同为前提。到18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先后论述舆论的本质与作用。伏尔泰断言：“人们把舆论叫做世界之王，舆论就是世界之王。因为，当理性来反对舆论时，理性就注定要完蛋。”<sup>③</sup>他高度评价了高于一切思想理论的舆论威力，认为任何力量都要在舆论反对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卢梭是西方近代系统研究舆论的第一个人，他提出，人民的意见有众意和公意两种，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而众意则是人们相同意志和不同意志的总和，真正的舆论是公意而不是众意。卢梭强调，舆论是第四种法律，即“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的法律。从18世界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葛德文、德国的黑格尔和法国的孔德都在其著作中对舆论进行过独到的探讨，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舆论活动的鼎盛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策论，构成中国思想史上一幅幅奇观叠出的画卷。孔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以及后来的左丘明、李斯等人先后阐述过深刻的舆论见解。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孟子的“举公议，辟私怨”，荀子的“君子必辩”等观点，制定了儒家的舆论活动方针，精辟地揭示了舆论规律的某些基本原理。特别可贵的是，曾参曾提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论断，相当于近代尊重民意的含义，他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主张“以民意定天下”的

人。

东汉末年，出现规模浩大的清议活动，到魏晋时期转化为清谈的流风，在中国历史上又推出一个波澜壮阔、五光十色的舆论繁荣时代。据记载，当时一些士大夫纷纷参与清议或清谈活动，各地儒师名流常常近千人云集在一起从事谈说，“高言伪仪，昼夜不息”。从汉末名士集团评论朝政，褒贬人物，到魏晋豪门士族手执麈尾，口谈玄虚，高谈阔论之风弥漫整个社会。舆论研究是舆论实践的产物，舆论发达必然要求揭示系统的舆论规律来指导，汉末、魏晋时代也就有许多名儒大师对盛极一时的社会舆论进行探讨，指出其中种种纰漏，揭露这种舆论在很大程度上“贤佞难别，是非倒纷”。但清议和清谈在客观上鞭挞了严峻的现实生活，暴露了皇族地主集团的残酷压榨。

明清时代，我国的舆论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几篇短论，探讨了清议、流言、直言、莠言、立言等舆论现象，把“列国之风，听舆人之诵”视作中华民族的舆论传统。顾炎武认为，允许民间自由评议朝政的清议活动应当作为我国优秀的民族习俗延续下来，这对维系社会安定具有重大作用。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sup>④</sup>。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形成，舆论学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黄金季节。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把议会视为“舆论表达机关”，开始对舆论进行纵深探讨。由于议会充满连绵不断的演说、辩论、质询、游说，舆论常常在讲坛上达到沸点，探索议会活动的特征、规律也就为议员、议长及一切议会活动家提供了驾驭公众意见的才智。法国社会家埃斯皮纳斯的一段

论述，足以说明西方在19世纪末对议会“技术”的钻研十分精深，他写道：

假定有位演说家，面对着三百人的集会发表演说，又假定他的激动心情可以用数字10来表示，而当他辩才初露的时候，至少把自己激动心情的一半传给三百个听众中的每个人，而每个听众则通过鼓掌或注意聆听来表示这一点，这时在每个人的姿态和面部表情上将呈现出某些紧张。于是，在场的每个听众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心情激动的演说家一个人，而且还有许多聚精会神或心情激动的听众。这种场面又会加强所谓议会中的“轰动”<sup>⑤</sup>。

这段简短的论述，使表达思想情感的艺术和社会心理传染的机能相结合，把议会内外的反响和演讲家的煽动作用统一起来，揭示了议会演说造成社会舆论的功能，这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角逐是极为有益的教诲。1899年，法国另一位社会学家塔尔德写出《舆论与公众》一书，成为人类舆论研究史上第一本专著。塔尔德认为，社会不过是各个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个人或集体之间包含着由一个意识向另一个意识传递的要素。这些要素渐渐融合在一起，最后形成思潮和群众性的冲动，并以舆论这种形态表现出来。1922年，被称作“美国未来总统先生”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出版了《舆论》一书，标志着舆论学在西方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该书涉猎广泛，全面描述了社会舆论运动的法则和规律，以精炼生动的文笔跨越十几个世纪的历史容量，展现出社会舆论与政治、民主、权力和公众利益的关系。他指出：“我的结论是，舆论如果是健全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为报刊所用，不像今天这样的情

况由报刊来组织。我想这样的组织任务首先属于政治科学，只有政治科学能在真正的决定作出之前成为舆论的形成者，而不是在决定作出以后去充当辩护士、批评家或报道者。”<sup>⑥</sup>在这之先，没有任何一位论及舆论的学者阐述过这样丰富、深刻的思想。《舆论》一书还给近百个舆论术语作出界说，使该书显露出清晰的学术著作的端倪，成为世界舆论学研究中一本奠基性的论著。

自《舆论》一书问世后，舆论研究广泛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成为一门独树一帜的综合性、边缘性科学，涌现出一批令人瞩目的鸿篇巨制。其中主要有美国的查尔斯·哈乌德 (Childs · Harwood) 的《舆论统治》(Rule by Public Opinion 1923)、日本池田内一的《舆论》(《心理学讲座》第10卷，1953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社会舆论的批评》(1922年)、苏联乌列多夫教授主编的《舆论与宣传》(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и пропаганда 1980年)等。

舆论学具有多学科的庞大体系，包括舆论学原理、通俗舆论学、舆论发展史、舆论测量学、舆论心理学和分支舆论学（诸如社会主义舆论学、新闻舆论学、群体舆论学等）六个部类。目前，在我国刚刚开始研究的是舆论学原理、舆论测量学和新闻舆论学。由于社会舆论和政局变化、权力更迭、社会治安、新闻宣传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西方通常把它称作驾驭民心的艺术或权术学。实际上，这是一门关于如何尊重民意、实行科学管理和社会控制的科学。当前，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

## 二、舆论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在许多舆论学研究者的笔下，舆论都呈现出一种无量、无极、无态的光环变幻，实在难以让人捉摸。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指出：“舆论涉及的是间接的、看不见的和费解的事实，它们是一点也不明显的。舆论涉及的那些情况只被认为是一些意见而已。”<sup>⑦</sup>人们“头脑里的想象，包括对于他们自己、别人、他们的需要、意图和关系等等都属于他们的舆论”<sup>⑧</sup>。不言而喻，舆论通常是指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切人的态度，那么，舆论学研究的范畴也就异常广泛。凡人民每天诉说的思想、浮动在社会观念外层的活性见解都是它探索的内容，比如：社会意见产生、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公众的要求、情绪和上层决策的关系；游说、口号、集会、游行示威的起因、性质和影响；民意测验的方法及其作用；微观社会环境中人们议论习惯的形成与特点；社会意见的两极方向——正确意见与错误意见的对立与相互转化；小道消息、诽谤、流言、谣言的产生、危害与扩展渠道；各种传播工具影响舆论的功能和方式，等等。总之，舆论学以社会表层意识作为研究的基点，力图把那些粗糙的、朴素的、零散的动态意识纳入科学认识的轨道。

舆论学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舆论的问题。人们大都认为，舆论是众人的“一致意见”或“公众意见”，但这一结论并没有揭示舆论的本质。人们为什么要形成一致意见？这种意见的属性是什么？上述答案不能给予确切的解释。实际上，社会中经常发生意见冲突，往往出现尖锐对立的观点。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存在大量公众

性事务和各种共同体，人们从切身利害出发对公众事务随时作出判断，以强烈的意向表达赞同或反对的态度。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态度经过交流、互补，就逐渐凝聚成若干集合意识与整体知觉，各自表现为内部成员消除私见差异的共同意识指向，这就是真正的舆论。舆论意识的整体性是以社会共同体多数人一致同意为标志的，如洛克所说，“任何共同体既然只能根据它的每个人的同意而行动，而它作为一个整体又必须行动一致，这就有必要使整体的行动以较大的力量的意向为转移，这个较大的力量就是大多数人的同意”<sup>⑨</sup>。如果多数人被迫接受一种观点，或被诱骗、收买、威逼而赞成某种意见，并不是真正的舆论。在探讨舆论的本质时，许多人往往把“被迫赞成”、被胁迫而共同高呼的声浪和自觉形成的集合意识混淆了，这就很难断定某种政治行为是否享有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

舆论并不是什么神奇、不可思议的力量，也不像伏尔泰所说的是“世界之王”，它不过是利益相近或相同的人们在政治、经济及其他交往活动中对公众事务发生的共同意识反射。社会生活不仅使人成为意识的个体，而且成为“类”意识的总体。“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由此，舆论不能不表现为在共同社会地位中生活的“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sup>⑩</sup>。人们正是为了表达同一“类”的要求和意愿，受到经济与政治利益的支配，方形成共同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指出，舆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制约，舆论要是保

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sup>⑪</sup>

舆论活动的天然主体是公众，即未经组织、具有共同意识目标的大大小小的社会群体、阶层、阶级或党派。凡思想靠拢、自动产生情绪共鸣的多数人就构成了公众。公众有直接相识和通过间接意识传递形成统一意志这两种类型。当某种意见具有一定范围的合理性，适合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的需要，就围绕这种意见形成大大小小的公众实体，社会舆论就在公众的言语行为中表现出来。在公众中，每个人都带有理性和自主思考的激情和愿望，其中，积极推销意见的人叫舆论人，这是一些自主性强烈、自觉投入某种宣传活动的公众中坚。在公众与舆论人的拱卫下，耸立着特定的舆论领袖集团，即少量杰出的、在群众中享有高度威望、富有感召力的政治领袖或各类知名人士。有些舆论领袖虽然过去默默无闻，但在一次或若干次社会事件中发表了扣人心弦的言论，引起广泛的响应，就由鲜为人知的舆论人转化为举世公认的舆论领袖。由此可见，真正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舆论领袖往往是思想深邃、言辞犀利、口角生风、富有鼓动能力和宣传艺术的人，同时又是代表广大公众利益、具有开拓精神的人。舆论的兴起，并不是物质利益、经济政治因素的自动产物，而是舆论人、舆论领袖直接煽动或鼓动的结果。舆论学强调公众、舆论人和舆论领袖等意识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打破了以往单层次研究人依赖生产关系的受制模式，开辟了探讨意识与存在双向关系的新视角。

舆论是社会交往的结晶。当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结成对应的、多方位的相互联系，就对它们共同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意见交换，并最终诉诸相近或一致的言行。舆论学要花费一定的篇幅探索舆论产生、形成的规律，寻求舆论消长的社会曲线。总括而言，舆论来自于社会变动，社会中的重大突发事件、有人提出涉及全局的新问题、或人们生活状况的陡然变化，都可能引起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与社会存在的变动而变动着。”<sup>⑫</sup>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重大转折关头，都是舆论浪潮汹涌澎湃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历史大转变时机，接连不断的突发事件、群众的不幸境遇、不公平的事理、长期不得解决的社会矛盾，必然引起众说纷纭，游说聚议。

舆论最初起始于街头巷尾。先是大量公众被舆论人所吸引，许多人凑在一起论长道短，形成无数舆论圈，正如“庶人之风，塉然起于穷巷”，飒然而至！这时，舆论人最多、最活跃的地方，出现最先的舆论浪潮，成为舆论中心。然后，在舆论领袖引导下，大量舆论圈相互连环，由舆论中心向外围地域扩展，呈现出“飘忽淜滂，耿眩雷声，回穴错迕”的气势。舆论产生的整个过程包括舆论人鼓动，舆论圈的形成，舆论中心的出现，由舆论领袖引导再到舆论广泛扩散等四个阶段。其中，集会演说、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游行示威等行为的一齐出现，是社会矛盾酿成舆论风暴的标志。

在封建专制时代，“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那时的舆论只有民意一种，无不受到皇权的摆布。现代舆论有上下层之分，下层舆论除了民意、还有团体舆论、

阶级舆论、公共舆论和群体舆论。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阶级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对立的阶级舆论总是采取舆论战的形式相互攻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民意是下层舆论中大量的、带有根本性的意见，它是社会舆论的主体，反映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上层舆论则是社会领导层次的意见，它应当是民意的集中反映。

舆论有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之分。不是所有舆论都代表公众利益、反映真实的客观矛盾，如何正确鉴别两种不同方向的舆论，是舆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确、进步的舆论对公众事务作出完整、全面、深刻、稳妥的判断，借助它可以延伸人的认识幅度，把握对超大型社会事件、乃至全国性、全球性问题的认识，从而促成重大的历史变革。那些深刻体现民意的公共舆论，在社会控制中能够抑制不良因素，刺激积极的效能因素，协调庞大、复杂的社会生活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社会环境中，批评性、揭露性的舆论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和社会法庭，对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产生巨大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威力来自对人的心灵制裁，使监督对象在舆论压力下进入自惭形秽的内省活动，甚至陷入精神崩溃。同时，舆论监督还要导致正式制裁的出现，引起行政或执法部门的注意，使人民的倾诉为法纪机关所接受。在“舆论——法纪机关”的链条中，公共舆论具有双重力量。

一切反动、错误的舆论都是不合时宜、践踏人民意愿的。它以虚张声势、哗众取宠、恫吓威慑的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并大量依恃谣言、偏见歪曲事物的真相，在荒谬绝伦的长啸中以巨大的舆论冲击波破坏社会的有序发展。这种舆论一旦蒙蔽

了群众，就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在小社会环境中，许多错误的群体舆论呈现出众口铄金的态势，兴风作浪胜过息事宁人，危言耸听压倒言必有据，使一些先进人物毁誉于流言之下。舆论能捧人也能杀人，被谣言致于死地的不幸事件在全国每年要发生数百起。随心所欲地猎取、传播他人的隐私，使一些单位的人际关系剑拔弩张，许多志在邦国的好汉在讥讽中壮志难酬，纯洁美丽的少女在秽言恶语前寻了短见，多年和睦相处的同事在无端的挑拨下产生隔膜……。社会管理者既要精明地运用舆论疏导人际关系，又要善于区别舆论的性质，使错误的舆论转化为正确的舆论。

舆论与权力的关系是舆论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西方舆论学都以权力为论述中心，阐明权力驾驭舆论的高超艺术，目的在于使当权者充分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的权力，这就是揭露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等权力”<sup>⑩</sup>。毫不夸张地说，舆论决定权力的运行机制，同时又受权力的支配，但如果权力失去舆论的支撑，它就无法逃脱垮台的命运。

在当今信息激增的时代，决策机构不顾舆论反响，仅仅听命于几个首脑人物的指挥，决策也就越要发生故障。个体认识只有在群体认识网络中“集合组装”，才能获得最佳的认识成果。民意调查、大众传播媒介、群体决策系统、微电子专家集团、新兴学科创造者群、各种科学共同体，从不同领域代表舆论首先逼近决策权力层。这些来自各方的民意动向就象认识的软件系统，预制出由各种微观认识汇合为

宏观认识的“切入”机制，使权力层很容易把握某项决策所应当包含的全部合理因素。如果权力无视舆论，弹压舆论，不仅使正确的决策能力丧失殆尽，而且必将威信扫地，末日来临。拿破伦曾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任何首脑的权力都是建筑在武力和人们在思想上对首脑权力的认可上的。一个首脑，如果威信下降，必然导致人们在思想上对首脑权力认可程度的降低。威信丧失，声誉扫地，一旦没有武力支持，必然导致首脑的下台⑭。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掌权人应当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当权力正确表达社会舆论、获得社会舆论支持时，权力就有力量驾驭一切，把握一切，舆论便成为权力“实力”的强大后盾；当权力违背民意，它的运转能量也就枯竭了。舆论对权力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是掌权人物把握社会趋向的动力资源，给权力机构提供预见社会变革、从事社会管理的大思路。

民意是亿万人民的主体精神，具有动态性、整体性和活泼性，如果按照科学方式准确地把握众说纷纭、喁喁啸鸣的民意方向，权力人物就能成为真理的预言家、民意的代言人。所以，民意测验是舆论学研究中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领域，又是全部舆论学说的归宿点，因为探索舆论规律和特征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民意，按照民意指向诉诸权力行为。由于民意测验依据合理的指标体系真实地模拟、显示广大群众的意见流向，根据它提供的数据制订决策，无疑能够杜绝歪曲、违背民意的错误，为

科学的社会管理建立多层面、全方位的反馈系统。

### 三、创立中国舆论学的立足点

实践需要科学，科学要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我国的舆论研究必须适合现实生活迫切要求，解决中华民族精神振兴、多党合作和群众议政中出现的动态意识的结构、流向和功能等问题。

由于当代信息发达，人类自主意识的增强，舆论多元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舆论研究本身必然是个开放系统。这就是说，我国的舆论研究必须面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面向各种社会思潮和各部门的管理活动与政治民主化。今天，社会各部门正在设立智囊团、公共关系部、思想库、信息中心，不断面向公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许多社会机构经常举办讨论会、答辩会、研讨会、听证会、协商会、新闻发布会和各种形式的对话活动，目的在于了解各种社会认识成果，把握社会舆论趋势，以便对各种社会问题及时作出科学对策。舆论学研究应当为人们的上述舆论活动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和民意动向的参数，使社会管理者按照舆论规律创造适宜的舆论环境。

为了使舆论学的理论体系有机地嵌入社会演进的宏伟图景中，突出认识逻辑的必然性，研究活动应当对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与现实事件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探讨，着重描述人们的舆论行为，全力揭示经济因素、政治动因，人物影响、偶然事变的合力对促成舆论的复杂作用。这就会使这门科学，在众多历史与现实事件的烘托下，展现一幅幅时代的雄伟画卷，而在画卷的平面上恰如其分地铸造出理论

“极光”。运用这种论证方式，能把高度复杂的意识现象化为单纯如一、掷地有声的全息图象，为舆论学理论的建树，开拓广阔、生动的认识源泉。舆论学的全部构思还应当从研究社会主体的人开始，只不过它探索的是人表达意见的活动及其归宿。由此，人发表见解所触及到的心理与社会、个体动机与群体动力、孤立的遐想与流行观念等诸种关系，便成为舆论学领域中的清晰脉络，而其中大写的人将占据核心的地位。过去，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学术方面，都无视个人的要求和利益，把人的社会性、阶级性看作高于一切，从而把不同于领导层次的许多个人的愿望和意见斥责为大逆不道，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知马克思主义“主体是人”的伟大思想。

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sup>⑩</sup>

当然，人离不开社会，他的舆论行为只有在社会联系中才能发生。不过，舆论学把人作为研究对象和其他社会科学选取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舆论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利益、政局变化对人产生一致态度的作用，再现社会动态意识影响人的种种诱因和舆论活动空间的特点。

我国的舆论学，应当是我们自己的创

造。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中华民族丰富的舆论实践活动，力主发掘我国传统的舆论思想宝库，而不是生搬硬套、简单拼凑外国的东西。在借鉴外国舆论学精华的同时，无论从概念确立还是到体系建构，其学科韵采都要适合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突出中国风格的学术特色。

我们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学，这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辩证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原理与当代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包含很多舆论学法则，但它本身并不是舆论学，因此，它只能给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不能代替舆论学。舆论学只有面向实际，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这一学科的综合性和意识整体性的优势，才能成为一门强有力指导实际的科学。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由于舆论直接以政治问题、社会思潮、人心向背为研究对象，它所触及到的内容必然都是异常敏感的热点。思想专制、思想僵化、就不可能给这门科学提供耕耘的土壤。加上不同阶级、学派对同一种舆论现象的认识可能截然对立，这就更加需要探索的勇气和求实精神。显然，只有大胆抛弃陈腐、落后的观念，破除“左”的思想束缚，才能把这门新兴科学推进到意蕴深刻的境地。

#### 注释：

- ① 《政治学》第16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政府论》下册，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下转第34页)